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历史

纪念版

东南亚的贸易时代：
1450—1680年

第一卷

〔澳〕安东尼·瑞德 著



SINCE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纪念版

东南亚的贸易时代： 1450-1680年

第一卷

季风吹拂下的土地

〔澳〕安东尼·瑞德 著

吴小安 孙来臣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 年. 第 1 卷, 季风吹拂下的土地/(澳)安东尼·瑞德著;吴小安,孙来臣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 分科本. 历史、地理类)

ISBN 978-7-100-13415-6

I. ①东… II. ①安… ②吴… ③孙… III. ①经济史—研究—东南亚—1450-1680 IV. ①F133.0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4934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 年

第一卷 季风吹拂下的土地

〔澳〕安东尼·瑞德 著

吴小安 孙来臣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3415-6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3 1/8

定价:52.00 元

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 - 1680

Volume One: The Lands Below the Winds

© 1988 by Yale University

(本书根据耶鲁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出版说明

2017 年 2 月 11 日,商务印书馆迎来 120 岁的生日。120 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

选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 20 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 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 1980 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 1981 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献给王赓武

献给王赓武

《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 年》

汉译名著版序言

安东尼·瑞德

获悉吴小安、孙来臣和李塔娜将我在 20 年前撰写的著作翻译出版，同中国读者见面，我倍感欣慰。这当然得力于三位译者的献身投入、翻译技巧与创造性，从而使拙著得到了专业性的翻译。翻译与写作本身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创造性工作；就某些方面而言，翻译比写作更为困难，因为原著无论多么难译，翻译者都必须进行翻译；而写作则不同，作者可以避难就易、避重就轻。拙著译者们专业权威、才华横溢，我为此深感荣幸。

有关东南亚历史的争鸣不断推陈出新；在拙著上下两卷出版 20 年之后，我们就更容易看清楚其所占有的地位。在我本人的治学生涯中，拙著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这一代学者着眼于对殖民主义历史的强烈批判，而我本人早期的著作即为其中的一部分。那时候我们需要了解新兴民族国家及其民族主义，掌握他们的语言，探索新的方法，以撰写以印度尼西亚人、越南人等为中心的历史。

回首过去，殖民主义史学家的确夸大了外来因素的影响，但上述民族主义的做法却容易将一个国家的历史同外来影响完全割裂



开来,而且也可能将那些不符合新兴国家历史的地方史边缘化。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专制政权(例如缅甸的奈温、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菲律宾的马科斯)推行一种由民族英雄主导的民族主义历史,但专职史学家们对此则不以为然。此外,在世界范围内,历史学科则正在抛弃那种以国家政治为历史驱动力的观点,而我们则力争聚焦于历史上更为广大的社会阶层,尤其是妇女、奴隶、农民、商人、工匠与其他下层人群。我发现用更为广阔的视野来探索这些问题更为有效适用,所以就先将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一些地区的历史进行对比,最后又将东南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审视。尽管东南亚地区是我的研究领域,但同其它几位同时代的学者一样,我也越来越多地去努力理解该地区同世界各地的联系。我也越来越感觉到,所有负责任的历史必须从全球历史的视野来撰写。从政治方面来讲,民族主义的历史对一个彼此互相依存的世界来说已经不合时宜;从环境方面来说,人类共同拥有地球这个小小的星球,所以我们也必须携手合作,共同探索其过去。

我认为,拙著在超越民族国家史和政治史、突出环境史及其与人类的关系,以及试图建立东南亚地区的整体性诸方面都进行了努力。

拙著分上下两卷,旨在像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那样,^①从历史发展的深层结构出发,进而论及其浮在表面的政治事件。上卷着力将东南亚地区的结构与特征综合为一个整体,而下卷则力图揭示一个时代(即东南亚的“贸易时

① 唐家龙,曾培耿,吴模信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出版。本序言原文所引著作皆为英文原著。为了便于读者阅读,举凡有中译本者,注释中皆采用中译本的出版情况和页码,没有中译本者则照直翻译。——译注

代”，系全球史中近世时代的一部分）的重要性，旨在构建与之相应的宗教、社会、经济与政治模式。

我在拙著中强调“贸易时代”作为东南亚地区的一个极具活力与决定性的时代；其上下两卷分别于 1988 和 1993 年面世后，学者们者对这一论点评论甚多。从正面的评论来看，学者们对东南亚历史中“近世时期”的研究已经大为活跃，不再将该时期附属于 20 世纪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将东南亚作为一个历史上有别于东亚和南亚的地区这一观点现在也被广泛接受；其独特的特征包括特殊的自然环境、密度低而且分散的人口，控制人口而非土地的重要性，以及妇女较高的自主地位等等。^①

当然，对拙著进行批评者也不乏其人，而他们的观点大致有三。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将东南亚地区视为一个整体的论点，即使不致大错，但也为时尚早，因为该地区的历史异常错综复杂，不能一刀切。第二种观点指出，15 世纪以前即有多个贸易时代，特别是 1300 年以前的那段时期（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宋代）；15 世纪以后也可能存在有贸易时代，例如 18 世纪晚期。^② 第三种观点认为我夸大了 17 世纪中期的危机（我主张这场危机结束了东南亚的

① 请特别参看芭芭拉·沃森·安达雅，《燃烧的子宫：重新定位近世东南亚的妇女》（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6 年）。

② 珍妮特·阿布-卢古，《在欧洲称霸之前：公元 1250 至 1350 年之间的世界体系》（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 年）；韦杰夫，《公元 900 至 1300 年间的早期贸易时代》，载《东南亚研究杂志》2009 年 40 卷，第 2 期，第 221—265 页。有关 18 世纪晚期的贸易扩张，可参看安东尼·瑞德主编，《独立亚洲的最后一搏》（贝辛斯托克：麦克米兰出版社，1997 年）与维克多·李伯曼，《形异神似：全球背景下的东南亚，公元 800—1830 年》（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 年），卷一，第 23—53 页。



“贸易时代”)。

第三种观点最有力的代表者为维克多·李伯曼。他在 1995 年针对拙著发表的一篇全面细致的评论中指出:“在我看来,17 世纪作为东南亚历史分水岭的论点根本不适用于东南亚大陆……无论是在缅甸、泰国还是在越南,自 15 世纪以来的政治与社会变化不仅仅持续到 18 世纪,而且在 19 世纪仍然加速发展,一直持续到殖民主义统治开始的前夕”。^① 他在该书评以及后来的一部著作中所提出的发展趋势包括海洋贸易与国内贸易、城市化、主要国家的领土巩固,民族与文化的趋同,以及合法性源自外部地区的正统宗教。李伯曼进而提出强有力的论点,认为六个欧亚大陆政体(包括越南、暹罗、缅甸、俄国、法国与日本)在 15 至 19 世纪期间都受到了这些整合趋势的影响。^②

对近世东南亚这样一个缺乏研究的领域来说,这种有益的争鸣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围绕论争实例磨练自己分析能力的宝贵机会,当然应该受到热烈欢迎。尽管我与李伯曼的研究重叠互补,但李伯曼主要是着眼于该地区国家的巩固整合,而我则研究其与世界贸易和外来思想的交接碰撞。我非常乐意承认,面对 17 世纪的危机,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特别是(但又不仅仅局限于)那些大陆国家,能够像日本的德川幕府那样从这种交汇碰撞中进行一定程度的撤退,并进而致力于内部的巩固。从国家巩固与文化趋同

① 维克多·李伯曼,《东南亚的贸易时代? 有关地区整体性的问题》,载《亚洲研究杂志》,1995 年 8 月,第 54 卷,第 3 期,第 801—804 页。

② 李伯曼,《形异神似:全球背景下的东南亚,公元 800—1830 年》,特别是第一卷,《东南亚大陆的整合》。

的角度来看这种趋势具有积极意义,但从其它角度来看则并非尽然如此。其它主要依赖贸易的“火药帝国”(例如亚齐与望加锡)则更容易分崩离析。无论如何,从以上任何一种观点来看,17 世纪的危机都仍然是一个转折点。李伯曼和我都同意“贸易时代”加强了合法性源自外部地区的正统宗教的吸引力,而这种宗教在此后的国家巩固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两人的近著都强调环境因素(包括气候与地震)并对其进行解释。

我不觉得有必要对这些批评——直接回应,但我的确在寻找更多的实际办法来衡量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的跌宕起伏,以便使该地区参与到围绕资本主义与现代性起源问题这些更高层次的争鸣中去。东南亚商品的出口在“超长的 16 世纪”的全球繁荣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有关这些出口的资料量化起来则最为容易。我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同事们搜集了有关丁香、胡椒、糖和咖啡长达六个世纪的出口资料。它们既清楚表明了 16 世纪的繁荣,凸显了 17 世纪 40 年代的出口高峰,也清晰地揭示了此后出口收入的暴跌,而其低谷则为 17 世纪 80 年代。^①

我认为,虽然我们必须承认 17 世纪中叶东南亚贸易的衰落,但问题在于从长远来看这一衰落的重要性到底如何。我们是将东南亚 19 世纪经济与政治的失败追溯至 17 世纪的挫折,还是认为有关东西方力量平衡与生产率的关键变化在 1800 年以后才开始?贡德·弗兰克在 1998 年出版的《白银资本》一书里竭力贬低亚洲

^① D. 布贝克,安东尼·瑞德,陈丽贞和吴一琪编撰,《14 世纪以来东南亚的丁香、胡椒、咖啡与糖出口资料汇编》(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1998 年)。



地区 17 世纪危机的重要性(当然,他讨论的重点是中国),旨在反驳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欧洲是资本主义唯一的发源地,也因此是现代性唯一的发源地)。弗兰克在对彭慕兰有关中国的精心细致的研究进行概括总结,使其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坚持说欧洲只是从 19 世纪才开始在经济上独占鳌头。^① 我认为,弗兰克过度贬低了亚洲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在 17 世纪危机中所受的挫折。

直到今天,这些争鸣仍然重要。我们对人类社会如何发展与互动的理解在日益增加,而东南亚地区的丰富历史在这种发展与互动中应占据其应有的地位。如果拙著的翻译能够促进读者对这些方面的理解,我将不胜感激。

2012 年于堪培拉

^① 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第 466—467 页。

《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 年》

汉译名著版译校序言

为了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 年》汉译名著版的出版，我们对该书 2010 年第一版进行了修改更正。贺圣达、刘志强教授以及匿名网友都对第一版翻译提出了宝贵意见，白铁先生帮助翻译其中有关印度尼西亚乐器的一句话，傅聪聪教授帮助解决一个马来语词汇的发音问题，瑞德教授为名著版提供了材料并回答有关问题，特别是原商务印书馆的常绍民先生为本书名著版的出版鼎力相助，我们在此特表谢忱。李塔娜对其所译的部分进行了修改。综合上述所有意见和建议，孙来臣通读全书、修改错误、补充遗漏、润色译文，并最后定稿。此外，名著版新增增加的原著者序言由孙来臣译出初稿，吴小安、李塔娜对初稿提出改正意见，最后由孙来臣汇总定稿。审校者仍对名著版翻译质量负责。



译校者序

翻译的不行,大半的责任固然该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

——鲁迅 1933 年《准风月谈》

从 2003 年开始酝酿,到 2009 年杀青付梓,安东尼·瑞德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 年》的翻译出版前后历时六年,集中翻译历时三年。其中的诸多曲折和挫折,让人深切体会到翻译“苦海无边”。曾多次想到“回头是岸”,但在中国东南亚研究亟需翻译引进的信念的强烈驱使下,译校者克服种种困难,化解重重危机,终于完成这一著作的翻译。对翻译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我们现作如下说明。

《东南亚的贸易时代》一书可谓经典之作,对国外东南亚研究影响巨大。本着这一认识,译校者在翻译伊始就一直认为经典著作需要经典翻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前前后后作了如下的努力。

翻译中最大的困难之一是大量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人



名地名,许多在中文中尚无固定译法。除了参考大量有关的文献外(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出),审校过程中我们还主要利用了下列辞典:

《东南亚地名译名手册》(星球地图出版社 1996 年版);

《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7 年版);

《世界地名翻译手册》(知识出版社 1988 年版)。

此外,我们也就有关地名、人名问题请教了北京大学的张玉安(印度尼西亚语)、裴晓睿(泰语)、吴杰伟与史阳(他加禄语)、王东亮(法语)和王军(西班牙语)教授,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我们的原则是尽可能“名从原文”,所以我们不满足于通过英文翻译过来的译名。所以,我们既参考了现有东南亚历史方面的中文译著(例如,中山大学译霍尔《东南亚史》、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周南京译李克莱弗斯《印度尼西亚史》)并采纳了其中的大量译名外,也对其中一些进行了取舍。例如,暹罗国王 Prasat Thong 以前译为“帕拉塞东”,但本书改译为“巴萨通”。但由于国内研究的局限,许多地名、人名仍然不得不从英语间接翻译,本书译文中也只好原封照搬。

有关缅甸的人名地名,学术界过去主要依赖姚楠译哈威《缅甸史》,但北京大学原东语系缅甸语教研室编《缅汉词典》,尤其是李谋等译《琉璃宫史》,完全根据缅甸原文重新翻译,可谓是一场意义重大的译名革命。所以,除了像多年来广为人知的萨尔温江(根据缅甸原文,应该翻译为“丹伦江”,而“萨尔温江”是根据英语拼法 Salween 的误读误译,是间接翻译的典型错误)外,我们基本上采



用了这些新的缅甸地名、人名。

有关欧洲的地名,尤其是人名,因为同样的拼写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发音(特别是英国和法国),我们以“名从国家”为原则,即对每个地名人名尽量首先断定其国别,然后进行翻译。例如,Denys Lombard 为法国学者,我们即按法语的发音译成“德尼·隆巴尔”。为此,我们还专门请教了克劳婷·苏尔梦(Claudine Salmon)和白诗薇(Sylvia Pasquet)。在此,谨向她们表示感谢。

除了地名人名外,对其他一些名词(包括专有名词)和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在译校过程中除了查阅大量各种辞书外,还尽量利用网络这种现代科技。中文网络像一本硕大无比的百科全书,为我们的翻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例如,我们既从网上查到了一般字典未收的英文字词的中文意思,又不断利用网络检验我们没有把握的译法。如果是一词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译法,我们则会选用出现频率高的那种。一些网络上的中英、英中词典也非常有用,例如“nciku 在线词典”就比较专业详尽。对我们不熟悉的内容,我们也尽量阅读有关材料(包括网上材料),力求使我们的译法专业地道。身处现在的网络时代、充分利用网络的优势解决疑难问题、提高翻译质量,使人深切感到当代科技的巨大力量。

最后,我们还向原书作者瑞德教授请教了一些疑难问题,更促进了我们对原文的理解,减少了翻译的错误或不确。

凡是原书中引用的中国、越南、日本和琉球以汉语书写的史料,我们都查阅原文,一一录出,以保持原文韵味。

为了保证翻译质量,减少错误,实现我们的翻译初衷,各位译者除了反复阅读、修改自己的初稿外,还进行了初稿互校,即一位

